

##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 Eurasia 基金會國際講座

### 「亞洲共同體：東亞學的構築與變容」系列講次(13)

#### 講題：日本中世的國家與宗教

中國文化大學 111 學年度 Eurasia 基金會國際講座第 13 回，邀請到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末木文美士老師以「日本中世的國家與宗教」為題擔任主講。演講中末木教授分別在 PPT 的第一頁及最後一頁中介紹了京都的金閣寺和壬生寺，並提到了足利義滿建佛寺的故事和傳統佛教活動。

在古代，佛教比天皇更佔優勢地位，這點可以從建造大佛的聖武天皇和支持道鏡的孝謙天皇（稱德天皇）中很容易地看到。但從桓武天皇再興神道開始，平安京內不再建造佛教寺院。末木教授說，中世紀相當於平安末期到室町時期，也就是 11 世紀到 15、6 世紀，日本的傳統國家結構特徵，基本上是在中世紀前期（10~13 世紀）確定了下來，並一直延續到江戶時代。

世俗的國家權力（王權・顯）和神聖的宗教權力（神佛・冥）在對峙的同時也有合作的結構。王權不是集中在天皇一個人身上，而是由攝政、關白和上皇所控制，12 世紀後半以後出現了武家政權，形成了以天皇為中心的朝廷和以將軍為中心的幕府對峙的結構。幕府執政的同時，天皇則擔負著以文化為中心的使命。在中國有《禮記》記載著很多應遵守的禮儀，在日本，律令雖然在 7、8 世紀已經完成，但由於無法跟上時代的變化，除了遵從所謂有職故實的考證之外，並沒有需維持的禮儀。另外，形式上任命將軍也是天皇的職責。這些職到十九世紀前半期基本上是沒有變的。

另外，在神道與佛教中，雖然佛法力量強大壓倒了在地的神的力量，但神的力量逐漸興起。直到中世紀為止，在神佛習合的影響下，本地垂迹的思想壓倒一切，但神道在 13~15 世紀左右普及化並逐漸從神佛習合中自立起來，18~19 世紀左右平田篤胤體系化了神道思想。

這種王權和神佛對抗的橫向型二元結構，是日本特有的。它不同於中國以儒教為中心，將佛教和道教排除在國家體制之外的縱向型一元結構，同時也不像泰國那樣，將佛教立於世俗王權之上的縱向型二元結構。

日本的這個二元結構在明治維新（1868 年）的巨大社會變革後發生了轉變。神佛分離令就是其象徵。近代的權力結構，是以天皇為中心的一元化結構，宗教也被改為服務於天皇。這樣的結構一直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（1945 年）為止。

那麼，中世紀的這種二元結構有什麼理論依據呢？這裏最引人注目的是天台宗的最澄（766/767~822）。最澄入唐求法，在日本弘揚天台宗，晚年意圖根據《梵網經》設立大乘戒（梵網戒）的戒壇（大乘戒壇），並向朝廷提出申請，直到死後才得到允許的批准。中國也使用的梵網戒，被定位為具足出家、在家通用的大乘菩薩

精神。出家人的戒律是以《四分律》為基的具足戒。最澄認為具足戒是小乘戒律，並否認之，主張出家人只需受梵網戒。

最澄認為梵網戒是出家、在家通用的，是「真俗一貫」的，並給予很高的評價。佛教界的菩薩相當於世俗的君子，兩者合作的體制被視為是理想的體制。佛教界的最高領導人被稱為國寶，身為精神界的領導人負責與世俗的領導人國王（天皇）一起創造理想的世界。次於國寶的佛教者被稱為國師、國用，成為各區域的精神指導者，以菩薩的利他精神來引導人們。

最澄這樣的理想未必能如願地實現，但以此為基礎，在中世的日本形成了王權和佛法相互抗衡且合作的二元結構。這樣的結構，既不是王權和佛法一體化，也不是解體，而是社會結構的兩輪。這樣的社會結構一直持續到 19 世紀中葉，但在面對歐美開國要求的幕末，權力結構的多重化、二元化受到威脅，因此被一元化。

另一方面，在佛教界，日本僧人因為沒有受具足戒，當他們要前往中國留學時，不被認可為出家人，被當作未受戒，被認為是見習的沙彌僧。因此，在江戶時代有所謂「偽戒牒」的發行。

儘管如此，王權和佛法均衡地相互幫助的結構，對比現今世俗權力暴力化而沒有一個可以幫忙剎車的狀況，實在有必要再深思。末木教授總結說，這樣的想法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憲章有着很深的關聯。

（網頁連結：<https://eurasia.pccu.edu.tw/index.php>）

（日文撰稿：齋藤正志 日文系教授 中文翻譯：涂玉盞 日文系副教授）